

魯迅路口

一

2002年又一次去了紹興。該看的上一次早已看過，若有所思的心裡有些寂寞。城市正在粉刷裝修；拆掉剛蓋好的大樓，改成黑白的紹興色。可能是由於天氣的原因吧，這一回頭頂著萬里晴空，總覺景色不合書裡的氣氛。在魯迅故居門口，車水馬龍根本不理睬遠路的遊客；滔滔河水般的群眾之流，擦著製作的假烏篷船一湧而過。我猶豫著，最後決定不再買票進去。

與其說是來再一次瞻仰遺跡，不如說是來復習上一次的功課。那一次在冬雨中，我們走過了一條條街道，處處辨認著遺跡和背景。那幾年我潛心南方的遊學，事先讀足了記載，到實地再加上草圖筆記。我辨認著，小街拐角座落的秋瑾的家，青苔沾濕的青藤書屋，還有山陰道、會稽山、古史傳說的夏禹陵。濛濛冷雨中的修學令人愉快，追想著那些日子，盼著再重複它一次。

雖然我明白這是一處危機潛伏之地。漸漸地我們終於明白了，這個民族不會容忍異類。哪怕再等上30年50年，對魯迅的大毀大謗勢必到來。魯迅自己是預感到了這前景的，為了規避，他早就明言寧願速朽。但是，畢竟在小時代也發生了尖銳的對峙，人們都被迫迎對衆多問題。當人們四顧先哲，發現他們大都曖昧時，就紛紛轉回魯迅尋求解釋。我也一樣，為著私人的需要，尋覓到了這裡。

反省著對他的失言與敗筆，我常自戒不該妄談魯迅。無奈乏於參照，於是又令人生厭地轉回這裡。我已經難改習癖，別人更百無忌憚。那麼多的人都在議論魯迅，那麼多的人都以魯迅為飯碗，那麼多的人都自稱魯迅的知音——這種現象，一定使他本人覺得晦氣透了。

不知到了譏諷的時代，一切會怎麼樣。

同伴是本地人，對是否進去參觀無所謂。我也覺得要看的都看過了，門票要 40 元呢，或者就不進去了吧。路口上，車聲轟轟人聲鼎沸，不由你過分地斟酌徘徊。於是胡亂決定離開，心裡一陣滋味索然。

就這樣，這一次在紹興過魯門而未進。雖然腳又踩過這塊潮濕土地，端詳過秋瑾的遺墨、進入了徐錫麟的臥室，我沒有邁過那個路口。我想保護初訪的印象。冬雨的那一次我夾在一群小學生裡一擁進了三味書屋，後來就親身站到了百草園。那時的感覺非常新鮮，自己的小學生時代、以及自己孩子的小學生時代一霎間都復活了。那不是來瞻仰偉人的故居，而是回到自己的孩提時代。一股那麼親近的衝動，曾在人流擁擠中幼稚地浮現。

從魯迅家的大門口邁步，左右轉兩個彎，隔一兩條小街，原來三百步之內，就是秋瑾的家。

初次意識到這一點時，我心中不由一驚。他們住得這麼近！……果然還是要到現地，才能獲得感受。我不住地遐想。彼此全然不相識是不可能的，即便沒有借鹽討火做過親密鄰里，也會由於留學一國彼此熟識。若再是朋友，就簡直是攜手東渡了。

後來去了徐錫麟的東埔鎮。冬月來時，以為東埔路遠不易到達，這一回才知東埔鎮就在眼前，公路水路都不消一陣功夫。這麼說，我尋思著，烈士徐錫麟的家鄉就在咫尺——這幾個人，不但是同鄉，而且是同期的留日同學。

站在路口上，我抑制著心裡的吃驚，捉摸著這裡的線索。

一切的起源，或許就在這裡？

二

1905 年是秋瑾留學日本的次年，其時魯迅作為她的先輩，已在

日本滯留了兩年。不知他們是否做好了思想準備，國家興亡與個人榮辱的大幕就在這一年猝然揭開，並與他們的每一個人遭遇。

一件大事是日本政府與清朝勾結，為限制留學生反清政治活動頒佈了「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」（應該注意，取締一語在日語中主要意為「管束、管理」）。此事引起軒然大波，秋瑾的表現最為激烈。

諸多論著都沒有涉及當時留學生的反應詳情；但參照（比如 80 年代末以來）留洋國人的多彩面孔，我想當時的諸多精英一定也是形形色色。冷眼看著中國留學生的樣相，日本報紙《朝日新聞》發表社論，嘲笑中國人「放縱卑劣，團結薄弱」。湖南籍留學生陳天華不能忍受，他以性命反駁蔑視，投海自殺。

與他們氣質最近的日本作家高橋和巳，對此事的敘述如下：

陳天華的抗議自殺，最富象徵地表現了投影於政治中眾多之死的、文化傳統與傳統心情的方式。

1909 年，日本的文部省公佈了《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》。不用說，這是應清朝的要請，限制留學生革命活動的東西。當時，《朝日新聞》侮蔑地批評那些反對《取締規則》、進行同盟罷課的中國留學生，說他們「出於清國人特有的放縱卑劣的意志，其團結也頗為薄弱」。陳天華痛憤於此，寫下了絕命書，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殺。

他在《絕命書》中說，中國受列強之侮，因為中國自身有滅亡之理。某者之滅，乃自己欲滅。只是中國之滅亡若最少需時十年的話，則與其死於十年之後，不如死於今日。若如此能促諸君有所警動，去絕非行，共講愛國，更臥薪嚐膽，刻苦求學以養實力，則國家興隆亦未可知，中國不滅亦未可知。

他區別了緣於功名心和責任感的革命運動，要求提高發自責任感的革命家道德。¹

¹ 高橋和巳：「暗殺者の哲學」，《孤立無援の思想》所收，旺文社 1979 年，第 193~194 頁。

每讀這一段故事我總覺得驚心動魄，也許是由於自己也有過日本經歷。陳天華感受過的歧視和選擇，儘管程度遠不相同——後來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國學生重複地體驗過。只是一個世紀過去到了這個時代，陳天華式的烈性無影可尋了。在一種透明的、鉅大的擠壓之下，海外中國人的感情、公論、更不用說行動，日復一日地讓位給了一種難言的曖昧。陳天華的孤魂不能想像：男性在逢迎和辯白之間狡猾觀察、女人在順從和自欺之間半推半就。

陳天華已經死了，活著的還在爭論。在侃侃而談中學人們照例分裂；有的是學成救國派，有的是歸國革命派，我想更多的一定是察顏觀色派。身為女性言行卻最為「極端」的秋瑾那時簡直如一個「恐怖主義者」，面對糾纏不休的同學，她居然拔刀擊案，怒喝滿座的先輩道：「誰敢投降滿虜，欺壓漢人，吃我一刀！」

而在場者中間就有魯迅。

顯然秋瑾不曾以魯迅為同志。或許她覺得這位離群索居的同鄉太少血性，或者他們之間已經有過齟齬。大概魯迅不至於落得使秋瑾蔑視的地步？在秋瑾的資料裡，找不到她對這位鄰居的一語一字。

我更想弄清當時魯迅的態度和言論。但是諸書語焉不詳，本人更欲言又止。漸漸地我開始猜測，雖然不一定有過爭吵和對壘，大約魯迅與同鄉的秋瑾徐錫麟有過取道的分歧。或許魯迅曾經對這位男裝女子不以為然；她太狂烈，熱衷政治，出言失度。魯迅大概覺得她不能成事，也不是同道。魯迅大概更嗅到了一種革命的不祥，企圖暗自掙扎出來，獨立於這一片革命的喧囂。

留學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複雜的事。留日體驗給於人的心理烙印，有時會終一生而不愈。

敏感的魯迅未必沒有感受到陳天華的受辱和憤怒，但是他沒有如陳天華的行動。或許正是陳天華事件促使魯迅加快選定了迴避政治、文學療眾的道路。

他的意識裡，說不定藏著一絲與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頭。但是時不人待，誰知鄰居女兒居然演出了那樣淒烈的慘劇、而他自己，卻只扮演了一個「看殺」的角色！

逐漸地，我心裡浮現出了一個影子。

它潛隨著先生的一生，暗注著先生的文字。我想諸多的研究，沒有足夠考慮魯迅留日十年釀就的苦澀心理。稱作差別的歧視，看殺同鄉的自責，從此在心底開始了浸蝕和齒咬。拒絕侮辱的陳天華、演出荆軻的徐錫麟、命斷家門的秋瑾——如同期的櫻花滿開然後凋零的同學，從此在魯迅的心中化作了一個影子。這影子變作了他的標準，使他與名流文人不能一致；這影子提醒著他的看殺，使他不得安寧。

也許就是這場留學，造就了文學的魯迅。

三

隔開了百年之後，尋覓魯迅如同盲人摸象。

但仍然還有思路可循，這思路是被作品中的處處伏筆多次提示了的。研究魯迅的事不能用顧頡剛的方法，但是一樣需要考據。

它不像考據山陰大禹陵；那種事缺乏基本的根據，誰也很難真能弄得清楚。魯迅的事情與我們干係重大，它不是一家之說壺中學術。流血的同學和魯迅幾位一體，身系著民族的精神。從1903年魯迅留學日本開始計算，整整一個世紀過去了；1907年徐錫麟和秋瑾死難的世紀忌日，也正在步步臨近。應該梳理脈絡，更應該依據履歷。這履歷中，有刻意而為的——他的做法，他的伏筆。

站在紹興的路口，眺望著魯迅紀念館和魯迅故居，還有出沒著正人君子的「鹹亨酒店」，我感到了作品的明示，和刻意的作為。

在經歷了陳天華、徐錫麟、秋瑾的刺激以後，或者說在使自己的心塗染了哀傷自責的底色以後，後日直至他辭世的所謂魯迅的一生，就像恐怖分子眉間尺的頭和怨敵在沸水裡追逐一樣——他與這

個日本糾纏撕咬，不能分離。

那以後的歷史可能是簡單的：「3.18」，「9.18」。「3.18」在北京的執政府門前再現了紹興的軒亭口，他絕不能再一次看殺學生的流血。「9.18」使那個日俄戰爭的幻燈片變成了身邊的炮火，使他再也不能走「純粹的文學」道路。

不是每一天都值得如陳天華那樣一死，但是每一天都可以如陳天華那樣去表現人格。回顧他歸國後的生涯，特別是「3.18」和「9.18」之後，顯然他竭盡了全力。他不能自娛於風騷筆墨中日掌故，如今日大受賞味的周作人。他不知道——苟活者的奮鬥，是否能回報殉死者的呼喚。想著陳天華和徐錫麟以及秋瑾，我感到，他無法掙脫一種類近羞愧的心情。

在中國，凡標榜中庸宣言閑趣的，大都是取媚強權助紂為虐的人。同樣，凡標榜「純粹文學」的，儘是氣質粗俗的人。

魯迅與他們不同；他做不到狡猾其藝術、中庸其姿態——而無視青年的鮮血，迴避民族的大義。但正是他曾嚴肅地拒絕激進，選擇了一介知識分子的文學療衆道路。但是江山不幸，文學是彷徨之路，魯迅一直掙扎在政治與文學之間。「3.18」，「9.18」，他不能不糾纏於這兩個結；他的交友立論橫眉悅目，都圍繞著這兩件事。而這兩件事，掙不斷地繫在一根留日的線上。

時間如一個不義的在場者，它洗刷真實催人遺忘。鄰居的女兒居然那麼淒烈地死了，他反芻著秋瑾逆耳的高聲，一生未釋重負。魯迅不能容忍自己在場之後的苟活，所以他也無法容忍那些明明在場、卻充當偽證的君子。

陳西滢不知自己的輕薄為文，觸動了魯迅的哪一根神經。他不懂學生的流血意味著什麼；他也不懂面對學生流血的題目，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言行禁忌。

徐懋庸之流也一樣，他們不懂在忍受了同學少年的鮮血以後，仍然被魯迅執拗選擇了的——文學的含義。他們不知自己冒犯了魯迅最痛苦的、作為生者的選擇。

後來讀到魯迅先生在當年的女子師範大學風潮之後，其實表示過對這種形式的反對：「請願的事，我一向就不以為然」，他說官府「他們麻木，沒有良心，不足與言，而況是請願，而況是徒手。」（《空談》）「我卻懇切地希望，『請願』的事，從此可以停止了。」（《「死地」》）

這正與陳天華無獨有偶。陳天華雖激烈殉命，但正是陳天華對那份管理規則不持過激態度。他在絕命書中寫道「取締規則問題可了則了，切勿固執。只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來，不要被日本報紙言中了。」

激烈並不一定就是過激。雖然在這個犬儒主義國家，我們習慣了媒體和精英用過激一語四處抹煞他人價值，但是歷史多次提示著：胸懷大激烈的人，恰恰並不過激。

四

不知道我是否過多強調了魯迅文學中日本刺激的因素。但確實就在他留學日本之後的五四時期，在《新青年》的頁面上，他突然展示了一種超人的水平和標準。他的最初也是最偉大的作品，都與家鄉的這兩位犧牲者、與留日的一幕有關。

徐錫麟事敗後，被清兵剖心食肉一事，甚至是他文思的直接引子亦未可知。所以就在他最早構思的時候，吃人行為就成了《狂人日記》最基礎的結構間架。魯迅在這個開山之作裡宣泄和清算，借著它的摩登形式。他不僅表達了所受過的刺激，也忍不住代徐錫麟進行控訴：「從盤古開闢天地以後，一直吃到……吃到徐錫麟！」

接著在短篇小說《藥》裡，秋瑾被寫作了墳墓中的主人公。作為短篇小說這一篇是完美的；故事、敘述、蘊意、人血饅頭和藥的形象，甚至秋瑾和夏瑜，這工整的對仗。高橋和已聯繫他在日本棄醫從文的經歷，指出「買人血饅頭吃的民衆，是圍觀同胞被當成間諜處死的民衆的延長。」

這樣寫的真实動機，埋在他思想最深的暗處。拋開徐、秋二同鄉的影子，很難談論魯迅文學的開端。套用日本式的說法，他們三人是同期的花；只不過，兩人犧牲於革命，一人苟活為作家。我想他是在小說裡悄悄地獨祭，或隱藏或吐露一絲懺悔的心思。

散文《范愛農》是更直接的透露。

這個特殊的作品如一篇細緻的日本檔案。當然，也如一幀辛亥革命前後的白描。除此之外，魯迅還未曾找到任何一個機會來傾訴私藏的心事。

范愛農是徐錫麟創辦的熱誠學校弟子，與魯迅同期的留日學生，一個革命大潮中的失意者和犧牲者。魯迅借范愛農的嘴和事，不露聲色地披露了如下重要細節：

徐錫麟一黨與他疏遠的事實。「你還不知道？我一向就討厭你的，——不但我，我們。」雖然關於疏遠的原因已無需深究，但魯迅依然半加詼諧帶過了這麼一筆。

其次，徐錫麟剖心殉難後，他在東京留學生聚會上主張向北京抗議的細節（這個細節，正與秋瑾在針對取締規則聚會上的拔刀相應），「我是主張發電的。」

最後，散文敘述的他與范愛農的交往，表白了他對死國難者的同學們的一種責任感和某種——補救。范愛農給了魯迅補救的機會，他們的相熟同醉，都使魯迅獲得了內心的安寧。窮窘潦倒的革命軍後來依靠著魯迅，這件事情是重要的。所以，散文記錄的瀕死前范

愛農的一句話，對魯迅非同小可：「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，拆開來一看，是魯迅來叫我的。」

范愛農死後，魯迅寫了幾首舊詩悼念。十幾年後寫作散文《范愛農》時他回憶了幾句，忘掉的一聯恰恰總結了這個情結：「此別成終古，從茲絕諸言。」

1926年這篇散文的發表，是魯迅與日本留學生糾葛的落幕。《范愛農》是魯迅對留日舊事的清理。他對一切最要緊的事情，都做了必要的辯解、披露、以及批評。這是那種作家不寫了它不能安寧的篇什。我想，當魯迅終於寫完了它以後，鬱塞太久的一團陰霾散盡了。一個私人的儀式，也在暗中結束了。

終於魯迅有了表白自己基本觀點的機會。他借王金發異化為王都督的例子，證明了革命之後必然出現的腐化。它更委婉而堅決地表明了自己拒絕激進、拒絕暴力的文學取道。在先行者的血光映襯下，這道路呈著險惡的本色。

五

陳天華死後已是百年。魯迅死去也早過了半個世紀。若是為著喚起中國的知識分子，也許他們真的白白死了。

——誰能相信，使陳天華投海的侮辱，其實連一句也沒有說錯。「特有的卑劣，薄弱的團結」，簡直可以挂在國門上。居然一個世紀裡都重複著同一張嘴臉，如今已經是他們以特有的卑劣，逐個地玷污科學和專業領域的時代了。

一百年來，中國的犬儒哲學從來沒有接受陳天華的觀點，更不用說對十足的恐怖分子徐錫麟和秋瑾。他們站在無往不勝的低姿態上，向一切清潔的舉動冷笑。在那種深刻的嘲笑面前每個人都又羞又窘，何況嶢嶢易折的魯迅！

或者，一部近代中國的歷史，就是這種侏儒的思想，不斷戰勝

古代精神的歷史。

但是，作為一種宣佈尊嚴的人格（陳天華）和表達異議的知識分子（魯迅），他們的死貴重於無數的苟活。由他們象徵的、抵抗和異議的歷史，也同樣一經開幕便沒有窮期。過長的失敗史，並不意味著投降放棄。比起那幾枝壯烈的櫻花，魯迅的道路，愈來愈被證明是可能的。

他不是志士，不過為苟活於志士之後而恥。由於這種日本式的恥感，他不得解脫，落筆哀晦。人譽他是志士不妥，人非他偏狹也不公。他心中懷著一個陰沉的影子，希望能如陳天華，能如秋瑾和徐錫麟一樣，使傲慢者低頭行禮，使蔑視者脫帽致敬。

後來參觀魯迅的上海故居，見廳堂挂著日本畫家的贈畫，不遠便是日本的書店，我為他保持著那麼多的日本交際而震驚。最後的治療託付給日本醫生，最後的摯友該是內山完造——上海的日子，使人感覺他已習慣並很難離開那個文化，使人幾乎懷疑是否存在過——恥辱和啟蒙般的日本刺激。

留學日本，宛如握著一柄雙刃的刀鋒。大義的挫折，文化的沉醉。人每時都在感受著，但說不清奧妙細微。這種經歷最終會變成一筆無頭債，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。無論各有怎樣的不同，誰都必須了結這筆孽債。陳天華的了結是一種，他獲得了日本人的尊敬；周作人的了結也是一種，他獲得了日本人的重用。

魯迅的了結，無法做得輕易。

其實即便沒有那些街談巷議，他與周作人的分道揚鑣也只在早晚。雖然後來人們都把陳天華秋瑾徐錫麟挂在嘴上，而唯有他深知他們的心境。從陳西滢到徐懋庸，他的敵手並不沒有這種心理。那些人內心粗糙，睡得酣熟，不曾有什麼靈魂的角力。而他卻常常與朋輩鬼類同行，他不敢忘卻，幾倍負重，用筆追逐著他們。

站在路口的汽車站牌下，我突然想像一個畫面：那是冬雨迷蒙的季節，魯迅站在這裡，獨自眺望著秋瑾的家。不是不可能的，他苟活著，而那個言語過激的女子卻死得淒慘。他只能快快提起筆來，以求區別於那些吃人血饅頭的觀眾。

他用高人一等的作品，以一枝投槍的姿態，回答了那個既侵略殺戮又禮義忠孝；既野蠻傲慢又飽含美感的文化。他成功了；他以自己的一生，解脫了那個深深刺激過他的情結。

他的了結恰似一位文豪所為——他沒有終結於作家的異化。向著罪惡的體制，他走出了一條抗爭與質疑的路。他探究了知識分子的意義，對著滋生中國的偽士，開了一個漫長的較量的頭。

六

據說紹興市要斥資多少個億，重造晚清的舊貌。

那邊的故居門口今年弄來了幾隻烏篷船擺設，彎腰鑽進去劃到大禹陵要45元。魯迅的天上盧罕（靈魂）一定正苦笑著自嘲，他雖然不能速朽，卻可以獻一具皮囊，任紹興人宰割賺錢。

既然不打算再進去參觀，我們就到了公共汽車站。

這一站，叫作「魯迅路口」。

對先生的追思，寫了這篇就該結束了；也許不該待那些吃魯迅飯的人太尖銳，像我一樣，人都是以一己的經歷猜度別人。人循著自己的思路猜想，寫成文字當然未必一定準確。

或許魯迅的文學，本來就不該是什麼大部頭多卷本長篇小說，也不是什麼魔幻怪誕摩登藝術。雖然他的文學包羅了衆多……尤其包羅了偽士的命題，包羅了與卑污的智識階級的攻戰。但是如果允許我小處著眼隨感發言——或者可以說，他的文學不過是日本體驗的結果和清算，是對幾個留日同學的悼念和代言。

公共汽車流水一般駛來這個路口，又紛紛駛離。天氣晴朗，可以看見秋瑾家對面的那座孤山。

大潮早已退了，幕落已有幾回。逝者和過去的歷史都一樣不能再生，人們都只是活在今日隨波逐流。無論蕭條端莊的秋瑾家，或者郊外水鄉的徐錫麟家，來往的都是旅遊的過客。他們看過了，籲噓一番或無動於衷，然後搭上不同的車，各奔各人的前程。

這個站的車牌很有意思。好像整個紹興的公共汽車都到這兒來了。每路車都在這個路口碰頭，再各自東西。一個站，排排的牌子上漆著的站名，都是「魯迅路口」。這簡直是中國知識界的象徵，雖然風馬牛不相及，卻都擁擠在這兒。

我注視著站臺，這一次的南方之旅又要結束了。

一輛公共汽車來了，人們使勁地擠著。都是外地人，都是來參觀魯迅故居的。在分道揚鑣之前，居然還有這麼一個碰頭的地方。我不知該感動還是該懷疑，心裡只覺得不可思議。